

## 晚清中國士人與西方政體類型 知識「概念工程」的創造與轉化 ——以蔣敦復與王韜為中心

潘光哲\*

西方政體(political regimes)類型知識在晚清時期的導入和傳佈，是近、現代中國(政治)思想變遷的重要面向之一。本文以蔣敦復與王韜的論說及思考為例證，由其思想變遷的具體歷史脈絡入手，考察西方政體類型知識的「概念工程」在晚清中國思想界的創造與轉化，以期為近代中國政治知識／政治思想多樣繁富的變遷樣態提供更深入的理解。

關鍵詞：政體類型、蔣敦復、王韜、知識倉庫、思想資源、晚清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 一、前言

1862 年 12 月，在日本近代思想史上佔有一席之地之加藤弘之(1830- 1916)，完成了《鄰艸》一書的撰著。<sup>1</sup>這是一部借大清帝國之情勢呼籲日本自身推動改革的論著，對「立憲政體」之導入日本，影響深遠；<sup>2</sup>加藤弘之述說世界萬國的「政體」類型，比較彼此優劣，藉以尋覓改革之道的思考，更始終持續不絕。<sup>3</sup>

這樣說來，十九世紀的日本知識人一旦知曉西方世界多樣多彩的政體(political regimes)，及其淵源已久的類型知識，<sup>4</sup>會對他們的思想世界帶來什麼樣的衝擊？加藤弘之正是具體而微的個例表徵。在晚清中國的思想界，像加藤弘之一樣，以述說世界萬國「政體」類型，比較彼此之優劣為視角，尋覓改革之道的思路，也有「異曲同工」的展現。本文之作，即以蔣敦復(1808-1866[1867]，又名劍人)、<sup>5</sup>王韜(1828-1897)這兩

---

<sup>1</sup> 加藤弘之，《政治篇》，《鄰艸》，頁 3-14；加藤弘之完成《鄰艸》寫作時間，據松岡八郎，《加藤弘之の前期政治思想》，頁 7。

<sup>2</sup> 島海靖，《日本近代史講義——明治立憲制の形成とその理念》，頁 27。

<sup>3</sup> 如加藤弘之稍後出版的《立憲政體略》(1868)，對「政體」之類型，與《鄰艸》則有異同，不詳論。參見奧田晴樹，《立憲政體成立史の研究》，頁 63，表 1，「政體分類の異同」。

<sup>4</sup> 如 Mark J. Gasiorowski 所述，早從亞理斯多德(Aristotle)以降，對於民主與其他政體類型(types of political regime)的問題，始終是政治探討的核心焦點；自從二次大戰以來，現代政治學與政治社會學對政體的探討，一直是學術前沿的課題，當代對於民主轉型(democratic transitions)的研究，也是在這樣的脈絡下出現的，參見 Mark J. Gasiorowski, "The Political Regimes Project," pp. 109-125. 至於他本人提出研治斯題的構想，此不詳論。

<sup>5</sup> 相關研究如：于醒民，〈蔣劍人——介紹西方資產階級民主制度的先行者〉，頁 89-93。年譜見：滕固，《蔣劍人先生年譜》。

位交情甚好而思想地位不可相提並論的士人為例證，<sup>6</sup>由彼等思想變遷的具體歷史脈絡入手，對西方政體類型知識的「概念工程」在晚清中國思想界的創造與轉化，並及西方「民主」相關思想如何導入晚清中國的場景，進行較為詳密的考察，<sup>7</sup>庶幾可為近代中國政治知識／政治思想多樣繁富的變遷樣態，提供深入的認識理解。

## 二・政體類型知識「概念工程」在晚清中國思想界的起步

十九世紀以降，在大清帝國被迫和西方國家開始密切互動的脈絡裡，認識世局變化、知悉異域情勢的諸種著述陸續問世，諸如魏源(1794-1857)纂輯的《海國圖志》(1842年初版，1852年增補為100卷再版)、<sup>8</sup>徐繼

---

<sup>6</sup> 關於王韜的研究甚多，中、英文傳記專書，各成巨帙，相關檢討，參見吳以義，〈王韜研究所提示的中國近代史的複雜性——評忻平《王韜評傳》和柯文《在傳統和現代性之間》〉，頁145-165；林國輝、黃文江，〈王韜研究述評附研究書目及補篇〉，頁491-533；陳雪嬌，〈王韜思想研究綜述〉，頁30-33；不過，既有之研究成果，並未出以本文的研究視角。

<sup>7</sup> 就相關研究而言，舉凡述說研究民主／共和相關思想在晚清思想界的認識或流傳者，皆與本文主旨多少有所涉及，例如：王爾敏，〈晚清士大夫對近代民主政治的認識〉，頁220-276；呂實強，〈甲午戰前西方民主政制的傳入與國人的反應〉，頁277-316；方維規，〈「議會」、「民主」與「共和」概念在西方與中國的嬗變〉，頁49-61；熊月之，〈中國近代民主思想史(修訂本)〉；胡維革、于秀芹主編，〈共和道路在近代中國〉；閻小波，〈近代中國民主觀念之生成與流變——一項觀念史的考察〉。在此基礎上，本文將對王韜述說之取材依據等方面，進行更精密的考察。

<sup>8</sup> 本文引用的《海國圖志》版本是「道光丁未(1847)仲夏古微堂鐫板」的60卷本，和「光緒二年(1876)平慶涇固道署重刊」的100卷本。以下引用，分別註明60卷本卷頁數，及100卷本卷頁數。另參見王家儉，〈魏源年譜〉，頁132-134。

畚(1795-1873)編撰的《瀛寰志略》(1848年初刻)等，皆為一時名著，總匯為人們得以瞭解世界局勢的「知識倉庫」。任何讀書人都可以隨其關懷所至，自由進出，據以瞭解域外國家的歷史沿革及現勢，認識與理解世界局勢的變化，採擷吸納各式各樣的「思想資源」，開展自身的獨特知識／思想旅程。<sup>9</sup>「知識倉庫」蘊涵關於西方政體類型的知識／資訊，為晚清中國的政治思維世界添加了新鮮的素材，讓士人得以知曉，在中國的政治傳統之外，別有天地。葡萄牙人瑪吉士(José Martins-Marquez)在1845年左右撰成的《新釋地理備考全書》，<sup>10</sup>就曾概括記述道：「歐羅巴中所有諸國，政治紛繁，各從其度。有或國王自為專主者，有或國主與群臣共議者，有或無國君，惟立冢宰執政者。」<sup>11</sup>

域外諸國的政體，紛繁無已，這段話是當時的「知識倉庫」裡首度提出的概括論說(此後，內容更為繁富的類似概括論說，更陸續入藏於「知識倉庫」之中)。對比於大清帝國自身皇帝「乾綱獨斷」的政體，「國王自為專主」的制度，並不讓人陌生；只是，它卻還提醒人們，世界上還

<sup>9</sup> 潘光哲，〈追索晚清閱讀史的一些想法——「知識倉庫」、「思想資源」與「概念變遷」〉，頁137-170；王汎森述說了日本導進的「思想資源」，對筆者甚有啟發；不過，他並沒有處理本文探討的課題。參見王汎森，〈戊戌前後思想資源的變化——以日本因素為例〉，頁47-54。

<sup>10</sup> 按：是書每卷卷首署名或作「大西洋人瑪吉士輯譯」(如卷1、卷5)，或做「大西洋人瑪吉士著〔著〕」(如卷2、卷3)；卷3，頁2a述及：「粵稽太〔泰〕西綱鑑俱記：乾坤始奠以來，迄今大清道光二十五年，共計五千八百五十二載」，是以此書當為道光廿五(1845)年左右的作品。瑪吉士與《新釋地理備考全書》及其被徵引的介紹，參見熊月之，〈《海國圖志》徵引西書考釋〉，頁142-143。

<sup>11</sup> 瑪吉士，《新釋地理備考全書》，卷4，頁21b。本段記述，《海國圖志》作：「歐羅巴中所有諸國，政治紛繁，各從其度。或國王自為專主者，或國主與群臣共議者，或無國君，惟立冢宰執政者」。參見《海國圖志》，100卷本，卷37，頁38b；不見於60卷本。

存在著與皇帝體制大相逕庭的政治制度，其中一種是「國主與群臣共議」的制度，另一種則為「無國君，惟立冢宰執政者」的制度。而且，放眼望去，後兩種制度，竟然普遍地存在於域外世界，不獨歐羅巴洲為然，更自成法度，運作不已。

就「國主與群臣共議」的制度而言，其內容包括兩個要項：一、存在著一個可以限制統治者權力的體制，二、這個可以限制統治者權力之體制的部分成員，經由「推選」產生，英國則是這等制度的典範國家；<sup>12</sup>就「無國君，惟立冢宰執政者」的制度來說，亦普遍於世，《新釋地理備考全書》即謂歐洲有「蘇益薩」國，由二十二個幾乎都「不設君位」的小國組成，如「伯爾尼國」，「不設君位，共立官長二百九十九員，辦理國務」等等。<sup>13</sup>徐繼畲的《瀛寰志略》則記述，歐洲有一個叫做「瑞士」的國家，「初分三部，後分為十三部，皆推擇鄉官理事，不立王侯」，還譽之為「西土之桃花源」。徐繼畲更讚贊瑞士制度，可以「懲碩鼠之貪殘，而泥封告絕」，<sup>14</sup>顯示了他認為此等制度具有可以祛除政治弊病的理想性格。

魏源纂輯的《海國圖志》，總匯相關資料為一帙，<sup>15</sup>即引用了《新釋地理備考全書》與《瀛寰志略》，不僅確定「蘇益薩」即為「瑞士」，是「不設君位」(或如《瀛寰志略》所云「不立王侯」)的國家，<sup>16</sup>也傳達了徐繼畲的好評。<sup>17</sup>抑且，這種制度非僅行之於瑞士而已，明代之後方始

<sup>12</sup> 潘光哲，〈晚清士人對英國政治制度的認識(1830-1856)〉，頁 147-196。

<sup>13</sup> 瑪吉士，《新釋地理備考全書》，卷 5，頁 22a-28b。

<sup>14</sup> 徐繼畲，《瀛寰志略》，卷 5，頁 155。按：「懲碩鼠之貪殘，而泥封告絕」的典故，出自《詩經·國風》。

<sup>15</sup> 關於《海國圖志》引用相關「西書」著述的整體狀況，參見熊月之，〈《海國圖志》徵引西書考釋〉，頁 132-146。

<sup>16</sup> 魏源，《海國圖志》，100 卷本，卷 47，頁 11b-12b。

<sup>17</sup> 若干論者誤將徐繼畲對瑞士制度的贊譽：「懲碩鼠之貪殘，而泥封告絕」

納入中國地理知識範圍的美洲(當時或以墨利加州，或以啞美哩加州稱之)，<sup>18</sup>其中有許多國家，它們更採行了一種與瑞士甚為類似的政治制度：「各國朝綱多有不設君位，大半皆立官宰理。其宰理之員，有黎庶公舉者，有歷代相傳者。」<sup>19</sup>對於這些國家的分別述說，更可見其大概情況，從《新釋地理備考全書》與《海國圖志》的記述略舉數例，即可窺見一二。<sup>20</sup>參見下頁表 1。

這種「不設君位」的制度，在域外國家非僅確有其事，在「知識倉庫」的積累裡，此等制度還有一個儼然亦成典範的國家：美國。關於她的知識／資訊，在「知識倉庫」亦稱豐富，既使人們可以掌握美國政治制度的基本樣態，也都有相當一致的好評。如徐繼畲讚譽美國制度「創古今未有之局」；<sup>21</sup>魏源則說美國元首(他用的辭彙是「大酋」)由「公舉」產生，非僅「不世及」，「不四載即受代」，另舉他人繼任，既是「一變古今官家之局」的制度，而且「人心翕然」，不致天下大亂，真是合乎「公」的理想的制度；<sup>22</sup>梁廷枏(1796-1861)的《海國

等語，當成魏源的好評。例如：熊月之，《中國近代民主思想史(修訂本)》，頁 78-79，實誤；餘例不詳舉。

<sup>18</sup> 如魏源，《海國圖志》，60 卷本，卷 39，頁 1a；100 卷本，卷 59，頁 1a 稱：「墨利加州……，明代始有聞」。

<sup>19</sup> 瑪吉士，《新釋地理備考全書》，卷 9，頁 10a；本段記述，《海國圖志》作：美洲「各國多有不設立君位，立官宰理，有黎庶公舉者，有歷代相傳者。」《海國圖志》，100 卷本，卷 59，頁 14b；不見於 60 卷本。

<sup>20</sup> 徐繼畲《瀛寰志略》對於美洲國家制度的敘述，並未均如《新釋地理備考全書》或《海國圖志》幾皆述及各國之制度，有所述及者，皆同此表所列，如《瀛寰志略》謂墨西哥於道光三年「廢國王，分為十五部，各推擇官長理事」，「其制大略仿米利堅」(頁 287)，秘魯「推擇長官理事，不立國王」(頁 294)，阿根廷「效米利堅推擇統領」(頁 298)。

<sup>21</sup> 徐繼畲，《瀛寰志略》，卷 9，頁 285。

<sup>22</sup> 魏源，《海國圖志》，60 卷本，卷 39，〈總敘〉，總頁 2177-2178；100 卷本，卷 60，〈總敘〉，總頁 197。

表 1

國家	《新釋地理備考全書》	《海國圖志》100卷本 【資料來源】
墨西哥	「美時哥國」：「不設君位，國人各立官長，司理地方。朝內有正副首領，權理國政」(卷9，頁15a)	「美詩哥國，一作墨西哥」：「不設君位，國人各立官長，司理地方。朝內有正副首領，權理國政」【地理備考】(卷64，頁6b) 「麥西可國」：「每八萬人擇一賢士會議掌政令，麥西哥選首領以攝其權」【外國史略】(卷64，頁10b)
瓜地馬拉	「瓜的嗎咭國」：「不設君位，黎庶各立官長，權理國政」(卷9，頁18b-19a)	「瓜的馬拉國」：「不設君位，各立官長理政」【地理備考】(卷66，頁3b) 「瓜亞地馬拉國」：「各部自立，國舉首領」【外國史略】(卷66，頁5b)
秘魯	「北盧國」：「不設君位，庶民自立官長，宰理國政」(卷9，頁25a)	「北盧國」：「不設君位，庶民自立官長理政」【地理備考】(卷67，頁12a)
阿根廷	「巴拉大河合眾國……」：「不設君位，庶民自立官長，司理國政」(卷9，頁30a)	「巴拉大河國……」：「官守自立，國人攝政，不設君位」【地理備考】(卷68，頁1b)
海地	「海地國」：「不設君位，國人自立官長，司理政事」(卷9，頁36b)	「海地島國」：「不設君位，國人自立官長，以理事」【地理備考】(卷70，頁5b)

四說》(1846年撰述完成)，包括專門述說美國的《合省國說》，<sup>23</sup>也讚譽美國制度改變了「君治於上，民聽於下」的規則，並實現「視、聽自民」的理想，而且由於「任期」的關係，美國總統(他使用的辭彙是「統領」)當然不會「貪侈凶暴」。<sup>24</sup>

簡要言之，瑪吉士以「國王自為專主」或是「國主與群臣共議」或是以「無國君，惟立冢宰執政」對西方國家的政體進行類型概括，在「知識倉庫」裡都可得到確證，對瑞士、美國等「無國君」諸國政

<sup>23</sup> 按，〈海國四說序〉撰於道光丙午年(1846)；是以《海國四說》最初於1846年完成。不過，駱驛等校點所據之《海國四說》原本，作者題署有「欽加內閣中書銜」(1851年事)，且《蘭荷偶說》有引《瀛寰志略》(1848年初刻)處，所以，此一版本的《蘭荷偶說》至少是1848年以後的作品。

<sup>24</sup> 梁廷枏，《海國四說》，〈合省國說·序〉，頁50。

體的認知，也引發各方士人的思考 and 好評。可以說，政體類型知識的「概念工程」，在晚清思想界一開始就引發了迴響；此後，隨著「知識倉庫」的擴展，陸續增添多彩多樣的相關知識，更是漣漪泛遠，激盪無限。

### 三、《大英國志》、蔣敦復與政體類型知識「概念工程」的現實意涵

1850 年代末期的上海人一直都不太清楚，才三十出頭的王韜，和比他年紀大上 20 歲的蔣敦復，為什麼有這樣好的交情。<sup>25</sup>1859 年 5 月 6 日，王韜又和蔣敦復聊起天來，議論風發。在上海墨海書館幫助西洋傳教士「佣書」已逾十年的他，<sup>26</sup>顯然得到不少新鮮的資訊，這回他又把自己的觀察心得，告訴蔣敦復：「西國政之大謬者，曰男女並嗣也，君民同治也，政教一體也。」從 1847 年就來到上海，專門協助管理上海墨海書館的偉烈亞力(Alexander Wylie, 1815-1887)聽到了王韜這番議論，<sup>27</sup>不太以為然：

是不然。泰西之政，下悅而上行，不敢以一人攬其權，而乾綱仍弗替焉。商足而國富，先欲與萬民用其利，而財用無不裕焉。故有事則歸議院，而無蒙蔽之虞；不足，則籌國債，而無捐輸之弊。今中國政事壅於上聞，國家有所興作，小民不得預知。何不仿行新聞月報，上可達天聽，下可通民意。況泰西之善政頗多，苟能效而行之，則國治不難。

<sup>25</sup> 王韜自述，與蔣敦復結識於「壬子十二月十有三日」(1853 年 1 月 21 日)。參見王韜，《淞濱瑣話》，頁 106。

<sup>26</sup> 王韜於 1849 年進入上海墨海書館工作，參見張志春，《王韜年譜》，頁 19-20。

<sup>27</sup> 關於偉烈亞力的研討，參見汪曉勤，〈偉烈亞力的學術生涯〉，頁 17-34。



王韜不太服氣，和偉烈亞力辯論起來：

泰西列國地小民聚，一日可以遍告。中國則不能也。中外異治，庶人之清議難以佐大廷之嘉猷也。中國多塗泥之區，土鬆氣薄，久雨則泥濘陷足，車過則倏洞窟穴。電器秘機，決然難行。他如農家田具種刈利器，皆以輪軸機捩運轉，事半功倍，宜其有利於民。不知中國貧乏者甚多，皆借富戶以養其身家。一行此法，數千萬貧民無所得食，有不生意外之變乎？中國所重者，禮義廉恥而已。上增其德，下懋其修，以求復於太古之風耳。奇技淫巧鑿破其天者，擯之不談，亦未可為陋也。<sup>28</sup>

偉烈亞力是不是被說服了，莫得其詳；王韜本人則很看重這回的談辯，詳細地記諸《日記》。蔣敦復也很同意王韜的想法，翌年，他寫作〈英志自序〉，稱：「君民共主也，政教一體也，男女並嗣也，此三者，英國之綱領也」；亦即把王韜的這番話改寫了一下，當成是「英國之綱領」。<sup>29</sup>

蔣敦復這裡提到的「君民共主」這個辭彙，應是漢語世界首見；十九世紀時期的中國人稱呼英國為「君民共主」的國家，「發明權」當歸屬於他。作為至交的王韜，日後大概也依據老友的意見，稱「泰西之立國有三，一曰君主之國，一曰民主之國，一曰君民共主之國」，放棄了「君民同治」一辭，轉而使用「君民共主」展開議論。<sup>30</sup>

28 王韜，方行、湯志鈞，《王韜日記》，咸豐九年四月四日(1859年5月6日)，頁112-113。

29 蔣敦復，《嘯古堂文集》，卷7，〈英志自序〉，頁2b-6a。本文寫作時間繫年為「咸豐十年(1860)」。

30 王韜，《弢園文錄外編》，卷1，〈重民〉下，頁19a-19b。當然，王韜另有其他分類述說，下詳。又，《弢園文錄外編》初刊於1883年，參見忻平，〈王韜著作目錄及版本〉，收入氏著，《王韜評傳》，頁244。

王韜提出的「君民同治」，究竟何意，並未清楚說明。<sup>31</sup>蔣敦復提出了「君民共主」這個辭彙，卻和自己在〈英志自序〉裡談到的世界各國的三種「立國之道」，略有出入：

地球九萬餘里，邦土交錯，立國之道，大要有三：一、君為政，西語曰恩伯臘(中國帝王之稱)，古來中國及今之俄羅斯、法蘭西、奧地利等國是也；一、民為政，西語曰伯勒格斯，今之美利堅(俗名花旗，在亞墨利加州〔洲〕)及耶馬尼、瑞士等國是也；一、君民共為政，西語曰京，歐州〔洲〕諸國間有之，英則歷代相承，俱從此號。王者僅列五等爵上，衣食租稅而已。<sup>32</sup>

無論是「君民共為政」或是「君民共主」，都可以用來指英國體制的意義。作為辭彙的首創者，蔣敦復對於應該使用哪些辭彙區分世界各國的政體類型，還不夠精確；他自己使用這些不見於漢語世界裡的新名詞，也經歷過概念的變化(在政體類型知識「概念工程」的建設過程裡，也有相同貢獻的論者，如王韜，亦有相類似的情況)。但是，即便辭彙的使用並不精確，表達的基本理念還算一致，都是要畫分世界各國政體的類型。追源溯流，這樣的思考傾向，來自於以英國倫敦傳道會的牧師慕維廉(William Muirhead, 1822-1900)<sup>33</sup>為主要翻譯者的《大英國志》(1856年首

<sup>31</sup> 王韜與蔣敦復有此番談話前，即已稱「政教一體」、「男女並嗣」與「君民同治」為「西國立法大謬」，參見王韜，〈與周弢甫徵君〉，收入朱維錚、李天綱編校，《弢園文新編》，頁194。據張志春，《王韜年譜》，頁43-44，本函繫年為1859年2月27日。

<sup>32</sup> 蔣敦復，〈英志自序〉，頁2b。

<sup>33</sup> 慕維廉於1847年抵中國，生平事蹟等，參見魏外揚，《中國教會的使徒行傳——來華宣教士列傳》，頁372-376；鄒振環，《西方傳教士與晚清西史東漸——以1815至1900年西方歷史譯著的傳播與影響為中心》，頁125-148；感謝清華大學葉毅均同學提醒筆者注意鄒振環的研究。

度出版)，<sup>34</sup>蔣敦復既是此書譯事的合作者，<sup>35</sup>接下了進行這項工程的圓鋤，也開展了新的思考路向。

### (一)《大英國志》與政體類型知識「概念工程」的進展

《大英國志》全書依據時序，完整述說英國自源始起，下迄 1856 年克里米亞戰爭結束，議訂〈巴黎和約〉的史事。十九世紀的中國士人，批卷展讀，正可知曉英國的歷史經緯及其政治社會制度；它提供的新知識，更往往引起反思，如述說「清教徒革命」時期英王查爾斯一世(Charles I, 1600-1649；《大英國志》謂之「查爾斯第一」)被送上斷頭台的故事陳跡，<sup>36</sup>就被中國士人視為「大逆不道」，引發了多樣的迴響，以過往學界認為思想上很少受到西方影響的朱一新為例，<sup>37</sup>述說「英王查爾斯為叛黨所弑，至聲王罪而肆諸市朝，振古所未聞也」一事的來源，就是這部書；<sup>38</sup>漢語世界至今描述英國政體的若干辭彙，更以其為濫觴。如是書將英國的 Parliament 譯為「巴力門」，<sup>39</sup>即為漢語世

<sup>34</sup> 慕維廉，《大英國志》，卷末附有〈《大英國志》續刻〉，已說及英法聯軍攻陷北京，1860 年 10 月「二十四日，和約立；十一月初五日，英、法兵退自北京；十二月二十七日，英京城宣講和約事」；查〈中英北京條約〉確實於 1860 年 10 月 24 日「蓋印畫押」，是則此一版本當出版於 1860 年 12 月 27 日以後。參見陳志奇，《中國近代外交史》，上冊，頁 394。

<sup>35</sup> 王韜在 1853 年薦蔣敦復與慕維廉，進行譯事，稿成於 1856 年，參見滕固，《蔣劍人先生年譜》，頁 19、21。

<sup>36</sup> 慕維廉，《大英國志》，卷 6，頁 12a-33b。

<sup>37</sup> 張灝即引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而提出這一觀點，參見 Hao Chang, *Liang Ch'i-ch'ao and the Intellectual Transition in China*, p. 4.

<sup>38</sup> 朱一新，《無邪堂答問》，卷 2，頁 30b-31b；又，《無邪堂答問》在他處亦徵引過《英國志》，如卷 2，頁 18a，不詳舉。

<sup>39</sup> 慕維廉，《大英國志》明確記載：1225 年「法王路易取英之地在法者羅舌，英人群議於巴力門……」(卷 4，頁 17a)；偶作「巴立門」，如：「英

界首見。<sup>40</sup>《大英國志》提供的某些辭彙，進入漢語世界已經超過一個半世紀，它的生命力還未曾中止。

在「知識倉庫」裡，《大英國志》提供了許多新的面向。它發凡起例，首先將英國政治制度的意義，安排在「天下萬國，政分三等」的整體脈絡裡開展述說：

天下萬國，政分三等：禮樂征伐自王者出，法令政刑，治賤不治貴。有國者，西語曰恩伯臘(譯：即中國皇帝王之號)，如中國、俄羅斯、及今法蘭西等國是也。以王者與民所選擇之人共為政，君、民皆受治于法律之下。有國者，西語曰京(譯：即王，與皇帝有別)，泰西諸國間有之，而英則歷代相承，俱從此號。又有無帝、無王，以百姓推立之一人主之，限以年數，新舊相代，西語曰伯勒格西敦(譯：即為首者之稱)，如今之合眾部是也。<sup>41</sup>

較諸前此《新釋地理備考全書》提出的簡略論說：「歐羅巴中所有諸國，政治紛繁，各從其度。有或國王自為專主者，有或國主與群臣共議者，有或無國君，惟立冢宰執政者」，<sup>42</sup>《大英國志》的分類論說，顯然更進一層。首先，它闡明了三種不同政體的國家元首，有什麼樣的不同稱謂，為政體類型之分類提供了簡潔明瞭的依據；其

---

史記載，首重法律，必君相與巴立門上、下兩院會議乃行。……」(〈凡例〉，頁2a)。通觀全書，以「巴力門」為主。

40 馬西尼(F. Masini)則稱「巴力門」此一辭彙首見於1874年出版的《教會新報》，實誤。參見馬西尼，黃河清譯，《現代漢語詞匯的形成——十九世紀漢語外來詞研究》，頁189。

41 慕維廉，《大英國志》，〈凡例〉，頁1a-1b。

42 瑪吉士，《新釋地理備考全書》，卷4，頁21b。本段記述，《海國圖志》作：「歐羅巴中所有諸國，政治紛繁，各從其度。或國王自為專主者，或國主與群臣共議者，或無國君，惟立冢宰執政者」《海國圖志》，100卷本，卷37，頁38b；不見於60卷本。

次，在後兩種類型裡，又以「民」(或「百姓」)推擇人選參與政治事務的權力到達什麼樣的程度(是「王者與民所選擇之人共為政」，抑或「以百姓推立之一人主之」)作為分類標準。因是，《大英國志》明確地表述了「天下萬國」如何可以「政分三等」的理據，還說明了它們各有什麼樣的內容。它的讀者，不單可以知曉英國的政體在「天下萬國」裡具有什麼樣的地位／獨特意義；也得以初步理解，其他國家(甚至包括大清帝國在內的政體，在這樣的類型裡又居於何等位置。可以說，《大英國志》在中國政治思維的領域裡，提供了簇新的「思想資源」。

在晚清中國的思想界，政體類型知識「概念工程」的成果繁多。《大英國志》首開風氣，它提出的基本述說架構，亦為後人承襲，影響力持續幾近半世紀。但隨著「知識倉庫」裡積儲的資訊越發豐富，其內涵則產生某種程度的變形，非復《大英國志》的本來面貌了。

## (二) 蔣敦復對政體類型知識「概念工程」的再開拓

蔣敦復作為《大英國志》翻譯事業的合作者，對這部書提出的政體類型的觀點與辭彙，應該是相當熟悉的。不過，起先他似乎混淆了《大英國志》的述說，既將「伯勒格西敦」改為「伯勒格斯」，並曰「伯勒格斯」為「君民共政之稱」<sup>43</sup>。到 1860 年他寫作〈英志自序〉時，則稱呼「民為政」的國家元首為「伯勒格斯」，此後就不再變易了。茲將其分別述說的政體類型，比較如下表 2。

<sup>43</sup> 蔣敦復，《嘯古堂文集》，卷 5，〈海外兩異人傳·華盛頓〉，頁 6b-7a；關於此文的撰作時間，參見文末附錄，蔣敦復〈海外兩異人傳·華盛頓〉撰述時間考。

表 2

論者 著作	慕維廉 《大英國志》	蔣敦復 《英志自序》	蔣敦復 《擬與英國使臣威妥瑪書》
年代	1856	1860	1866-1867
總述	天下萬國，政分三等：	地球九萬餘里，邦土交錯，立國之道，大要有三：	泰西各國，政有三等：
君主		君為政	
元首 名稱	有國者，西語曰恩伯臘(譯即中國皇帝王之號)	西語曰恩伯臘(中國帝王之稱)	西語曰恩伯臘者，即中國帝王之號
國家	如中國、俄羅斯、及今法蘭西等國是也	古來中國及今之俄羅斯、法蘭西、奧地利等國是也	今俄羅斯、法蘭西、奧地利諸國是也
說明	禮樂征伐自王者出，法令政刑，治賤不治貴		政刑大事，君自主之
君民 共主	泰西諸國間有之，而英則歷代相承，俱從此號	君民共為政	君民共為主
元首 名稱	有國者，西語曰京(譯即王，與皇帝有別)	西語曰京	西語曰京
國家		歐州〔洲〕諸國間有之，英則歷代相承，俱從此號	今之英國是也
說明	王者與民所選擇之人共為政，君、民皆受治于法律之下		
民主		民為政	民為主
元首 名稱	西語曰伯勒格西敦(譯即為首者之稱)	西語曰伯勒格斯	西語曰伯勒格斯
國家	如今之合眾部是也	今之美利堅(俗名花旗，在亞墨利加州〔洲〕)及耶馬尼、瑞士等國是也	今南、北美利加等國是也
說明	無帝、無王，以百姓推立之一人主之，限以年數，新舊相代		

蔣敦復的論說內容，和《大英國志》略有不同，基本的論說格局則尚稱一致，都以國家元首的稱呼作為分類標準。在政體類型知識「概念工程」開展的時候，本來並沒有「民為政」、「君民共為政」/「民

為主」、「君民共為主」這等提法；顯然，正是從蔣敦復開始，政體類型知識「概念工程」的成果，更進一層。

就 1860 年代的言論脈絡觀察，蔣敦復視美國政體為「民為政」(或「民為主」)，此論其實另有「競爭者」。以日後擔任過大清帝國出使英國欽差大臣的張德彝(1847-1918)為例，出身於同文館的他，19 歲起就開始出洋遠遊，得以見識異國風情的多番樣貌；<sup>44</sup>又在 1866 年 7 月 19 日訪問俄國期間，即論道：「美國乃官天下民主之國也，傳賢不傳子，每四年眾舉一人為統領，稱伯理璽天德」。<sup>45</sup>未及弱冠之年的張德彝，知道美國「每四年眾舉一人為統領」，與「知識倉庫」的述說完全一致，其使用「伯理璽天德」來稱呼美國總統，則清楚顯示這個辭彙在「知識倉庫」出現的跡象。<sup>46</sup>惟他以「傳賢不傳子」詮釋美國政體的意義，乃「官天下民主之國」，則是「知識倉庫」裡新鮮的述說。<sup>47</sup>

約略同一時代裡，對於美國政體有類似認知的例證，是張德彝的老師，曾任同文館總教習的傳教士丁韞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

<sup>44</sup> 關於張德彝的出身及其歷次出國情況和著述，參見：鍾叔河，《走向世界——近代中國知識分子考察西方的歷史》，頁 87-107、頁 177-192；蘇精，《清季同文館及其師生》，頁 174-178。

<sup>45</sup> 張德彝，《航海述奇》，收入《稿本航海述奇匯編》，第 1 冊，頁 301-302。此段記述，《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收錄之版本作：「……美國乃官天下民主之國也，無君無臣，每四年眾保一人為首，稱百理璽天德」。張德彝，《航海述奇》，收入王錫祺輯，《小方壺齋輿地叢鈔》，帙 11，頁 33b。

<sup>46</sup> 按：晚清時期以「伯理璽天德」一辭稱呼美國總統，是個「流行」。但首創於誰，尚難得悉。早在 1844 年時，清廷官方文書即已使用「伯理璽天德」，如：〈兩廣總督耆英奏為照錄美使所譯漢字國書呈覽摺(道光廿四年八月十四日[1844 年 9 月 25 日]奏呈)〉附〈咪喇堅漢字國書〉云：「亞美理駕合眾國伯理璽天德玉罕泰祿恭函，專達於大清大皇帝陛下……」。參見文慶等纂輯，《籌辦夷務始末》，卷 72，頁 47b。相關研究成果，略可參考熊月之，〈晚清中國對美國總統制的解讀〉，頁 1-11。餘不詳舉。

<sup>47</sup> 不過，張德彝對美國政治制度的其他述說，另有誤失，本文不詳考究。

1827-1916)翻譯的《萬國公法》(1864年出版)。這部書堪稱「國際法」知識引進東亞世界的「共同知識文本」之一，<sup>48</sup>影響深遠；<sup>49</sup>是書於述說「自主之國」在「內政」方面「自執全權，而不依傍於他國」的脈絡裡，如是言之：「若民主之國，則公舉首領官長，均由自主，一循國法，他國亦不得行權勢於其間也。」<sup>50</sup>

從上下文脈絡來看，所謂「民主之國」，意指「公舉首領官長」的國家。依據惠頓原書核校，「民主之國」的原文是“republican” form of government，<sup>51</sup>同書亦曰「美國合邦之大法，保各邦永歸民主」，<sup>52</sup>原意當謂美國《憲法》第4條第4款規定：「合眾國保證聯邦中的每一州皆為共和政體」(The United States shall guarantee to every State in this Union a Republican Form of Government)。<sup>53</sup>所以，《萬國公法》這裡所謂的「民主之國」，其實指的是「共和形式的政府」。<sup>54</sup>

48 「共同知識文本」是筆者鑄造的辭彙，意指約略從1830年代以降，西方傳教士與東亞各國知識人共同致力，生產製作介紹世界局勢與西方知識的著述，例如《海國圖志》、《瀛環志略》或是《萬國公法》等著作，同時在東亞世界流通，廣受閱覽，彼此能夠同潤均享，引發了多重多樣的歷史效應；如梁台根以《佐治彞言》為中心，就這部曾於中、日、韓三國流傳的「共同文本」，如何展現了當時引進、傳播和吸收西方知識的場景，也指陳東亞內部複雜的知識傳播互動脈絡。參見梁台根，〈近代西方知識在東亞的傳播及其共同文之探索——以《佐治彞言》為例〉，頁323-351；不過，是文專注於《佐治彞言》，並未特別指陳其他著作的情況。

49 關於《萬國公法》在晚清中國的影響，研究甚眾，最稱精要者厥為林學忠，〈從萬國公法到公法外交——晚清國際法的傳入、詮釋與應用〉。

50 丁建良譯，《萬國公法》，卷2，頁13b。

51 參照 Lydia H. Liu, *Translingual Practice: Literature, National Culture, and Translated Modernity — China, 1900-1937*, p. 267.

52 丁建良譯，《萬國公法》，卷2，頁13a。

53 裴孝賢編輯，《美國歷史文獻選集》，頁42。

54 不過，「民主」一詞在《萬國公法》裡出現18次，有時也等於“democratic



張德彝所謂的「民主之國」，意涵未必即與《萬國公法》相同；然而，兩者交集所示，至少呈顯出將美國稱為「民主之國」的趨同態勢。日後政體類型知識「概念工程」的進展，會確定美國是「民主之國」之一，始終不易，應當以 1860 年代為起點。

隨著「知識倉庫」的持續擴建，「民為政」與「民為主」這兩組辭彙，漸次被簡稱為「民政」和「民主」，往往交互並用，可以等同；不過，「民主」仍蘊涵傳統中國「民之主」(即國家元首)的意思。<sup>55</sup>如張德彝在 1870 年再隨崇厚出使法、英，他記述此行的著作《三述奇》就說法國自普法戰爭戰敗之後，<sup>56</sup>於 1870 年 9 月 7 日當日「眾議改為民政……以民主執國政焉」。<sup>57</sup>所謂「眾議改為民政」，當即指稱一種政治制度；「民主執國政」，則當指國家元首。然而，在 10 月 31 日時，他則稱法國要員已然商議「以立民主之邦」。<sup>58</sup>由是可見，「民政」和「民主」固可交互等同；「民主」仍與其傳統意味交雜相陳。張德彝的用法，在 1870 年代初期並不是孤例。1873 年創始，廣泛報導西方各國消息的《西國近事匯編》，<sup>59</sup>當其創刊伊始，報導古巴獨

---

republic”與“democratic character”的翻譯，參見金觀濤、劉青峰，《觀念史研究——中國現代重要政治術語的形成》，頁 230。

<sup>55</sup> 如《尚書·湯誓》：「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以成厥功」、《尚書·蔡仲之命》：「乃惟成湯克意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左傳》襄公卅一年：「穆叔……見孟孝伯。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不似民主。』」、《國語·晉語四》：「〔勃鞞〕曰：『君實不能明訓，而棄民主』」。筆者利用中央研究院「漢籍全文資料庫」，就「民主」一辭在廿四史與十三經進行查檢得到的資料，率皆此意義，不詳舉。

<sup>56</sup> 張德彝，《三述奇》，收入氏著，《稿本航海述奇匯編》，第 2、3 冊。

<sup>57</sup> 張德彝，《三述奇》，總頁 342。書前〈《三述奇》敘〉繫年為「同治十二年(1873)歲次癸酉春」。

<sup>58</sup> 張德彝，《三述奇》，總頁 349-350。

<sup>59</sup> 關於《西國近事匯編》之述說，眾說紛紜，立基於前行研究而有比較精確

立的消息時，即混合共用「民政」與「民主」二辭：

古巴島之叛於西班牙也，以欲更民政，而王不從，故狡焉思逞，大啟兵端。今既改為民主之國，自是如願相償，想不日就撫罷兵矣。<sup>60</sup>

從上下文脈絡觀之，「欲更民政」，致啟兵端，「既改為民主之國」則「不日就撫罷兵」，顯然，「民政」、「民主之國」兩者的意思相同。而它也稱法國、瑞士都是歐洲「主民政」的國家，並提供法國「開國而後凡三易民政」的訊息。<sup>61</sup>

從整體脈絡來看，自蔣敦復創始的「民為政」與「民為主」這樣的辭彙，被簡稱為「民政」和「民主」，兩者可以交互並用，互相等同，都用以指稱像美國、法國或瑞士那些經由選舉程序而產生國家元首的國家。大約是 1870 年代初期出現的這股態勢，持續不絕。大清帝國出使英法欽差大臣郭嵩燾(1818-1891)或以「民政」或以「民主」稱述法國的政治體制，即為一例。<sup>62</sup>大眾媒體亦從之襲用，甚且可以夾雜使用既存的各等辭彙／概念，以為評驚之資。如《申報》於 1876 年刊出署名「呆呆子」者之文稿，評論英國「意欲於英王君主加上印度

---

之介紹者當推：原付川、姚遠、衛玲，〈《西國近事匯編》的期刊本質及其出版要素再探〉，頁 104-106。

<sup>60</sup> 《西國近事匯編》，卷 1，頁 46a。

<sup>61</sup> 原文是：「歐洲諸國，除西班牙而外，主民政者，一為法國，一為瑞士。瑞士之主民政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法國之主民政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而且求治太急，好事更張，為之下者積習相沿，驟難變易，故自開國而後凡三易民政，而卒不能久。……」《西國近事匯編》，卷 1，頁 47b-48a。

<sup>62</sup> 郭嵩燾於 1878 年 7 月 27 日游歷法國「議政院」時即謂「路易第十六被弑，改為民主之國」，1879 年 2 月 21 日則感嘆法國本為「強國」，「立君千餘年，一旦改從民政，群一國之人挈長較短，以求逞其志，其勢固有岌岌不可終日者矣」。郭嵩燾，《郭嵩燾日記》，卷 3，頁 581-582、775。

皇帝」一事即謂：

泰西立國有三，國主之稱謂亦有三：一為民主之國，西語曰「伯勒格斯」，南北花旗與現在之法蘭西是也；一為君民共主之國，西語曰「密施」，即英國是也；一為君主之國，西語曰「的士坡的」，俄羅斯是也。<sup>63</sup>

蔣敦復不曾言及的「民主之國」、「密施」、「的士坡的」與他創發的「伯勒格斯」等辭彙，<sup>64</sup>同時躍然於讀者眼前。這篇文稿的作者，未必直接援用蔣敦復，但其對政體類型的表述基本無誤。由此不僅可以想見既存的認知廣傳流遠的情況，也具體彰顯政體類型知識的「概念工程」，在思想言論的舞台上，已然佔有一席之地。

### （三）政體類型知識「概念工程」與「政體抉擇」——「蔣敦復式」的問題

在政體類型知識「概念工程」發展的歷程裡，蔣敦復對於應該使用什麼樣的辭彙開展分類，定下基調，實有開風氣之先的「功勞」。不過，蔣敦復的思緒所至，與現實結合，竟讓他意識到政體類型的知識，不會只是單純的「知識」，反而可能會引發「政體抉擇」的問題，關涉所及，實非同小可。

蔣敦復清楚地知曉「巴力門」在英國政治運作裡的關鍵地位：

操君民政教之權者曰巴力門。巴力門，上、下二院，君有舉措，詔上院，上院下下院；民有從違，告下院，下院上上院；國中

<sup>63</sup> 呆呆子稿，〈論西報英王加號議爰及中國帝升王降之說〉，《申報》，1876年5月4日，版1。

<sup>64</sup> 所謂「密施」或即“monarch”，「的士坡的」或為“despotic”。

納賦，必會議乃成。律法定自兩院，君、相不能行一法外事。<sup>65</sup>正因「巴力門」權力至大如此，他認為大清帝國若仿而效之，「大亂之道也」。蔣敦復之論本於中國傳統「君綱」至上的觀點，他強調，「《春秋》大義明于中國，君臣之分甚嚴也」，「未聞王者不得操予奪生殺之柄」，「未有艸野細民得曰立君由我」，所以他知曉查爾斯一世被處以極刑後，「舉朝宴然，無所謂戴天之仇與討賊之義」，實在「不覺髮指」。<sup>66</sup>《大英國志》記載，「巴力門」嘗行「悖亂之事」，把國王查爾斯一世送上斷頭台。蔣敦復的批判，顯然「有的放矢」。

蔣敦復的整體論說，更帶有某種程度的「民族主義」情緒。他論證了「君民共主也，政教一體也，男女並嗣也」作為「英國之綱領」，並感嘆英國「駸駸乎民制其君，教隆於政，女先乎男」，全無可取，所以，「幾何不以外夷輕中國也」，但是，現實卻是「奈之何，而我中國而為外夷所輕也」，故他「為此懼，作《英志》」。<sup>67</sup>蔣敦復寫作這篇文章的 1860 年，類似偉烈亞力提出的「泰西之善政頗多，苟能效而行之，則國治不難」這樣的觀點，可能已經在他周遭的生活世界瀰漫開來，王韜批判「西國政之大謬者」，鄭重其事地反駁偉烈亞力的論點，並書之《日記》，也是他們得思考是否該效行「泰西之善政」這等問題的旁證。蔣敦復「放矢」之「的」，看來可能更不僅限於《大英國志》而已。

然而，「中國」／「外夷」的對立局面，一日重於一日，甚至於「外夷」竟大言不慚地提出「試問中國將來能常為自主之國否」的質疑。蔣敦復利用自己可以掌握的知識，「理直氣壯」，論證中國當然是「自主之國」，毫不客氣地予以回應。但是，老問題依然存在。蔣

<sup>65</sup> 蔣敦復，〈英志自序〉，頁 3b-4a。

<sup>66</sup> 「格蘭瓦」，即 Oliver Cromwell(1599-1658)。

<sup>67</sup> 蔣敦復，〈英志自序〉，頁 6a。

敦復竭力論證模仿「民為主」、「君民共為主」(即以美國和英國為樣式的制度)都是「大亂之道」，卻阻止不了士人政治思維的變化趨向，開展對「政體抉擇」的思考，甚至於連本來也認為「君民同治」是「西國政之大謬者」之一的王韜，其思緒竟也都朝相反的方向前進。「蔣敦復式」的憂慮與思考，影響久遠，正證明了蔣敦復的「獨到」眼光。

有趣的是，「蔣敦復式」的問題的真正「挑戰者」，來自於老友王韜對法國歷史的介紹而導引出來的成果。王韜述說法國歷史沿革的名著：《法國志略》(《重訂法國志略》；以下均引為此名)與《普法戰紀》出版問世之後，<sup>68</sup>使得政體類型知識「概念工程」又得到一個變遷繁複幾令人目不暇給的例證，再有進展。

## 四、「法國例證」的導入與政體類型知識「概念工程」的躍進

### (一)「法國例證」的混沌

十九世紀時期的法國政體，歷經了重大的變化。中國人對這個國家的認識，也隨著她的變動而困惑不已。僅就《海國圖志》收錄的訊息而言，她的政體，即相當繁雜，參見下頁表3。<sup>69</sup>

<sup>68</sup> 按，《普法戰紀》最先自1872年9月3日起刊登於香港《華字日報》，自1872年10月2日起至1873年8月4日止連載於上海《申報》，1874年初集結為專書(14卷本)在香港刊行。參見呂文翠，〈文化傳譯中的世界秩序與歷史圖像——以王韜《普法戰紀》為中心〉，頁86-87。

<sup>69</sup> 本表僅節錄《海國圖志》100卷本的不同述說，不詳引所有述說，俱見《海國圖志》，100卷本，卷41、42，不詳註出處。

表 3

資料	內容	備註
《四洲志》	政事：設占馬阿富衙門一所，官四百三十員，由各部落互相保充，如英國甘文好司之例。	
《外國史略》	道光十年後，佛(即法國)國王自操權，按國之義冊，會商爵士、鄉紳，以議國事；…… 法國有「公會」，必派國之大爵有名望者，百姓中每年納餉銀五千員〔圓〕以上者，推為公會之鄉紳，預論國事，能言之士最多。	60 卷本 不見
《地球圖說》	道光二十七年，民叛，國王逃避於英國，國民又自專制，不復立君矣。	60 卷本 不見

正因為法國政治變動不已，難能知其確貌，如何述其本相，令人煞費苦心。如朱克敬(?-1887)的《通商諸國記》，既複製了《瀛寰志略》的述說，顯然也知道法國在這些年間幾經滄桑，提供的訊息，即形構為相當有趣的組合。<sup>70</sup>參見下頁表 4。

朱克敬的述說，出現在 1870 年代下半初期，增添的紀錄所本為何，莫知其詳。<sup>71</sup>他的述說，大致無誤，在制度方面的述說，則一承《瀛寰志略》，幾無變易。較諸同一時代親履其地的張德彝對於法國

<sup>70</sup> 朱克敬，《通商諸國記》本文云：日本於「光緒初又攻滅琉球」(頁 6b)，此當為 1875 年事；又云墨西哥、巴西「請通商，尚未定約」(頁 8a)。按，北洋大臣李鴻章奏巴西遣使議約摺(1880 年 7 月 12 日)，言及巴西於是年「遣使來華議約」，而「中巴會訂和好通商條約」簽訂於 1881 年 10 月 3 日，1882 年 6 月 3 日在上海互換，故本文當視為 1870 年代下半期的作品。參見田濤主編，《清朝條約全集》，卷 2，頁 667-675。關於朱克敬的生平，參見楊堅，〈前言〉，朱克敬著，楊堅點校，《暝庵雜識·暝庵二識》，頁 1。

<sup>71</sup> 例如朱克敬說「路易非立」立，「名曰人民王，謂土地不屬王，而公屬人民也」，此一述說，與「知識倉庫」其他的述說相較，惟王韜，《重訂法國志略》，卷 7，頁 3b 有相似的述說：1830 年法國發生政變，「上、下兩議院公舉」路易腓立，「曰民之王，謂國土不屬於王而屬於民也」。可以推想，兩者的述說，當必有其本源。朱克敬，《通商諸國記》，頁 4a 述說英國處，曾引用王韜的《普法戰紀》：「《普法戰記〔紀〕》稱英國兵十萬」，但看不出來他引用《重訂法國志略》的前身《法國志略》的跡象。

制度的詳盡記述，<sup>72</sup>朱克敬的「辛勞」，對「知識倉庫」的擴建，沒有太大的貢獻。這也正清楚顯示，沒有機會得到更多資訊管道的士人，難能確切掌握法國政體變化的完全樣態。補缺彌陷的工作，由王韜承其職責。

表 4

著述	內容
《瀛寰志略》	路易即位數年卒，弟查理立(一作加爾祿斯)，愚戇不任事，在位九年，國人廢之，擇立支屬賢者路易非立(一作盧義斯非里卑)，即今在位之王也。以道光九年嗣立，性寬仁，好納諫，有賢聲。…… 其制：宰相一人，別立五爵公所，又於紳士中擇四百五十九人，立公局。國有大政，如刑賞征伐之類則令公所籌議，賜關稅餉則令公局籌辦。相無權，宣傳王命而已。…… <sup>73</sup>
《通商諸國記》	…… <u>路易即位數年死，弟查理立，愚戇不任事，在位九年，國人廢之，擇立支屬賢者路易非立，名曰人民王，謂土地不屬王，而公屬人民也(時為泰西一千八百三十年)……，性寬仁，好納諫，有賢聲。會用兵摩洛哥，又連年水旱，公會紳士欲廢古法及財產傳家之例，均貧富，一男女之權；姦民乘間作亂，聚眾攻王。王兵敗出奔，臣民共推前王拿破崙之姪叙魯斯路易為總統……未幾，……廢公舉法，黜陟惟上，劫臣民留己為總統十年。又大會國人，尊己為法國世襲皇帝。(同治九年)興兵伐德，四戰皆北……法王力盡出降……乃推<u>麥亞</u>為總統……<u>麥亞</u>旋以老辭位，<u>麥馬韓</u>代之，仍改民國舊制。</u> <u>國置宰相一人，別立五爵公所，又於紳士中擇四百五十九人，立公局。國有大政，公所議之，相無權，宣命而已。……</u> <sup>74</sup>

<sup>72</sup> 張德彝記述「法國國政」曰：「其權不歸統領而歸國會：分為兩堂，曰上會堂、下會堂」，「下會堂共五百三十二人，屆時各縣公舉一人。若居民數逾十萬，准加一額。凡被舉之人，至幼者亦須二十五歲；其出名薦主亦必年逾二旬方准列銜。入會堂者，限以六年為定制」等等，不詳引，俱見張德彝，《四述奇》，光緒四年四月十日(1878年5月11日)日記，頁69-72。對比之下，朱克敬對法國制度方面的述說，承襲《瀛寰志略》，幾無變易，並無太大的價值。

<sup>73</sup> 徐繼畲，《瀛寰志略》，卷7，頁198、202。

<sup>74</sup> 朱克敬，《通商諸國記》，頁2b。

## (二) 王韜導入的「法國例證」與政體類型知識的變化軌跡

王韜畢生筆耕不輟，約略在 1870 年代初期，他就完成兩部與法國歷史密切相關的著述：《重訂法國志略》與《普法戰紀》，都是十九世紀中國人認識法國歷史沿革與現況的主要依據之一。王韜撰述這兩部書，用意深刻，既是補充前此「知識倉庫」的空白，也有「引法為鑒」的現實意義。<sup>75</sup>他寫作《重訂法國志略》，嘗自日本人的著述取材，<sup>76</sup>晚清中國透過日本轉手，吸收西洋文明，王韜則是首開風氣者。<sup>77</sup>整體而言，王韜的努力，貢獻多樣，不僅讓「知識倉庫」裡增添了關於法國情勢的知識，透過法國政體變遷的概括論說，更使政體類型知識「概念工程」的「完善化」，又得到一項有力佐證。

<sup>75</sup> 忻平，〈王韜與近代中國的法國史研究〉，頁 166-174。

<sup>76</sup> 如果詳細比對《重訂法國志略》與相關的日本著述，應可明其實，姑舉「共和」一辭為例：

《重訂法國志略》	岡本監輔編纂，《萬國史記》
1892 年 11 月，法國「傳檄四方，曰：各國人民苟有背政府、倡共和新政、排擊舊憲者，法國當出援兵」(卷 5，頁 27a)	1892 年 11 月，法國「傳檄四方，曰：各國人民苟有背其政府、倡共和政、排擊舊憲者，法國當出援兵」(卷 10，頁 22a)
籌國會初議廢王位，立共和新政……(卷 5，頁 28a)	籌國會初議廢王位，新立共和政……(卷 10，頁 22b)

因此，王韜應該承襲自日本方面，讓傳統中國指稱周厲王時「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史記·周本紀》)的「共和」概念，賦予新鮮的意義，蓋箕作省吾(1821-1847)的《坤輿圖識》(1845)，首先將“Republiek”譯為「共和政治 / 共和國」。參見齋藤毅，《明治のことば——文明開化と日本語》，頁 119-120。

<sup>77</sup> 當然，王韜的著作(如《普法戰紀》)亦曾流傳日本，影響彼方，王韜與日本知識人更甚有往還，參見徐興慶，〈王韜と近代日本——研究史の考察から〉，頁 87-115，餘例不詳舉。



王韜《重訂法國志略》歷數 1789 年「法國大革命」之後政體變化的軌跡，亦將法國政治制度的變化意義，安排在對「泰西國例」的整體脈絡裡述說：

泰西國例，有自主之國、有民主之國、有君民共主之國。其為民上者，操權既異，而名號亦因之以別。自主者，稱恩伯臘，譯言帝；民主者，稱伯理璽天德，譯言大統領；君民共主者，稱為京，譯言王。稱帝者，如俄羅斯、法蘭西、奧地里諸國是也；稱王者，如英吉利、西班牙諸國是也；稱統領者，如美利堅之聯邦是也，而歐洲之瑞士國亦屬近是。法國向時本是國君主政，自一千七百九十二年易為民主之國；一千八百四年，又易為世及，拿破崙第一即位，是為拿破崙朝。一千八百十四年，波旁朝恢復舊物，傳世者兩君。一千八百三十年，波旁支派約奧理杭雷斐烈者，重改為民主。千八百四十八年，民亂，逐王於外，於是國中無君，乃議改為黎拔布勒(譯即眾大臣合議國政)。是時柄國諸大臣中推拿破崙渦那拔為首，是即拿破崙第三。……拿破崙第三權力才略素為眾所折服，因舉之為大統領，主國事職，若聯邦之伯理璽天德。……千八百五十二年……十一月七日，渦那拔議將伯理璽天德改號曰帝……群論僉同，遂改伯理璽天德曰帝，傳國世次，曰拿破崙第三，國位以世代遞嬗，無子傳弟或兄弟冢嗣。……一千八百七十年普法構兵，拿破崙第三兵敗被俘，國中無主。一千八百七十一年二月十七日，……眾推大臣爹亞暫攝國政，八月三十一日，改號伯理璽天德。一千八百七十三年五月二十四日，爹亞辭位，眾復推大將軍麥馬韓為伯理璽天德……十一月，議定權主國政，以七年

為期，於是法遂為民主之國，以迄於今，未之有改也。<sup>78</sup>

這段述說雖不免含混之處(如「波旁支派約奧理杭雷斐烈」當政，究竟是「民主」，還是「王」?)，但還算清楚地表達了法國政體的變遷脈絡：國君主政→民主之國→世及→民主→黎拔布勒→伯理璽天德→帝→民主之國。王韜在這裡以統治者的名稱作為區分三種政體的標準，和他在《普法戰紀》的區分標準一致：

泰西諸邦立國有三等，曰君為主，如昔之法蘭西及今之俄羅斯、奧地里、普魯士是也；曰民為主，如今之法蘭西及瑞士、美利堅等國是也；曰君民共為主，如英吉利、荷蘭、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日爾曼列邦皆是。君為主者，稱帝，西語曰恩伯臘；民為主者，稱總統，西語曰伯理璽天德；君民共為主者，稱王，西語曰京。此三者名謂雖殊，實則無所區別，蓋不以是為大小也。<sup>79</sup>

再與王韜在 1883 年推出的《弢園文錄外編》裡提出的述說相較：

泰西之立國有三，一曰君主之國，一曰民主之國，一曰君民共主之國。如俄、如奧、如普、如土等，則為君主之國，其稱尊號曰恩伯臘，即中國之所謂帝也。如法、如瑞、如美等，則為民主之國，其稱尊號曰伯理璽天德，即中國之所謂統領也。如英、如意、如西、如葡、如噠等，則為君民共主之國，其稱尊號曰京，即中國所謂王也。顧雖稱帝、稱王、稱統領，而其大小強弱尊卑則不係於是，惟其國政令有所不同而已。一人主治於上，而百執事萬姓奔走於下，令出而必行，言出而莫違，此君主也。國家有事，下之議院，眾以為可行則行，不可則止，

<sup>78</sup> 王韜，《重訂法國志略》，卷 16，頁 1a-3a。

<sup>79</sup> 王韜，《普法戰紀》，〈凡例〉，頁 1a。

統領但總其大成而已，此民主也。朝廷有兵刑禮樂賞罰諸大政，必集眾於上、下議院，君可而民否不能行，民可而君否亦不能行也，必君民意見相同，而後可頒之於遠近，此君民共主也。論者謂：君為主，則必堯、舜之君在上，而後可久安長治；民為主，則法制多紛更，心志難專一，究其極，不無流弊；惟君民共治，上下相通，民隱得以上達，君惠亦得以下逮。都俞吁咈，猶有中國三代以上之遺意焉。<sup>80</sup>

茲將王韜個人提出的三種分類，列表對照，《重訂法國志略》與《普法戰紀》的兩種述說，都稍嫌簡單了些。參見下頁表 5。

《重訂法國志略》與《普法戰紀》的分類，都以稱呼國家元首的辭彙做為標準，和蔣敦復的兩種分類標準亦復相同，可見蔣、王這兩位好朋友的論說，應當都同源於《大英國志》。然而，《弢園文錄外編》的論說，在分辨國家元首的稱謂之外，添加了「國家政令」之所出的標準，即以「權力」來源做為政體類型之判準。可以說，《弢園文錄外編》的述說，應當是王韜個人政體類型知識「概念工程」的最後「定本」。<sup>81</sup>

王韜《弢園文錄外編》的述說，明確使用「君主之國」、「民主之國」與「君民共主之國」這樣的「標準辭彙」，正是前此政體類型知識「概念工程」的一個初步總結。他還非常鮮明地批判「君為主，

<sup>80</sup> 王韜，《弢園文錄外編》，卷 1，〈重民下〉，頁 19a-19b。

<sup>81</sup> 又，王韜指稱 1789 年法國大革命之後的政體為「共和」，但是，他本人則將之與「民主」混用，如或說法國於 1792 年 9 月 21 日「議會宣告創立共和政體，以是日為共和第一月第一日」，又謂 1793 年 8 月，「籌國會下令國中改古來政體，稱民主國」，或於介紹「麥須兒之詩」的脈絡裡說 1792 年法國「自立為民主之國」；至於王韜混用「共和」與「民主」的情況，是否承襲於日本著述，不涉大旨，不詳比對。參見王韜，《重訂法國志略》，卷 5，頁 28a-28b；《普法戰紀》，卷 1，頁 25a-25b。

表 5

著作	《重訂法國志略》	《普法戰紀》	《弢園文錄外編》
總述	泰西國例，有自主之國、有民主之國、有君民共主之國。其為民上者，操權既異，而名號亦因之以別。	泰西諸邦立國有三等，曰君為主……曰民為主……曰君民共為主……此三者名謂雖殊，實則無所區別，蓋不以是為大小也。	泰西之立國有三，一曰君主之國，一曰民主之國，一曰君民共主之國……顧雖稱帝、稱王、稱統領，而其大小強弱尊卑則不係於是，惟其國政令有所不同而已。
君主	自主之國	君為主	君主之國
元首名稱	自主者，稱恩伯臘，譯言帝	君為主者，稱帝，西語曰恩伯臘	其稱尊號曰恩伯臘，即中國之所謂帝也
國家	稱帝者，如俄羅斯、法蘭西、奧地利諸國是也	如昔之法蘭西及今之俄羅斯、奧地利、普魯士是也	如俄、如奧、如普、如土等
說明			一人主治於上，而百執事萬姓奔走於下，令出而必行，言出而莫違，此君主也
君民共主	君民共主之國	曰君民共為主	君民共主之國
元首名稱	君民共主者，稱為京，譯言王	君民共為主者，稱王，西語曰京	其稱尊號曰京，即中國所謂王也
國家	稱王者，如英吉利、西班牙諸國是也	如英吉利、荷蘭、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日爾曼列邦皆是	如英、如意、如西、如葡、如暹等
說明			朝廷有兵刑禮樂賞罰諸大政，必集眾於上、下議院，君可而民否不能行，民可而君否亦不能行也，必君民意見相同，而後可領之於遠近，此君民共主也
民主	民主之國	民為主	民主之國
元首名稱	民主者，稱伯理璽天德，譯言大統領	總統，西語曰伯理璽天德	其稱尊號曰伯理璽天德，即中國之所謂統領也
國家	稱統領者，如美利堅之聯邦是也，而歐洲之瑞士國亦屬近是	如今之法蘭西及瑞士、美利堅等國是也	如法、如瑞、如美等
說明			國家有事，下之議院，眾以為可行則行，不可則止，統領但總其大成而已，此民主也。

則必堯、舜之君在上，而後可久安長治；民為主，則法制多紛更，心志難專一，究其極，不無流弊」，反而讚譽「君民共治，上下相通」，「猶有中國三代以上之遺意焉」。相對地，王韜更批判說，法國自從拿破崙以降，「政出一人，庶眾不服，異論頻興，屢改為民主之國，幾於視君如奕棋，大亂因之」，<sup>82</sup>對於走向「民主之國」的實踐道路，不以為然，「視君如奕棋，大亂因之」。可以說，王韜終究還是做出了個人「政體抉擇」的表態，以「君民共主之國」為尚。<sup>83</sup>

從整體的趨勢來看，大致從 1860 年代末期開始，「民主之國」、「君民共主之國」這些辭彙已經在漢語世界裡得到比較固定的意涵了，前者指的是如美國(與 1870 年以後的法國)這樣的國家，國家元首的名稱是「總統」或「伯理璽天德」；後者則主要以英國為代表，國家元首的名稱是「王」。王韜導入「法國例證」之後，更可豐富人們的認識。當然，王韜不是唯一公開述說法國情勢變動的論者，如朱克敬與王韜對法國的述說，頗稱類似，可以想見，他們的述說，當必有其共本。在當時的「文化市場」上，必定還存在著得以為「知識倉庫」擴充建設的其他史料，有待史家廣求文獻，以明其實。

### (三) 政體類型知識「概念工程」的趨同與變異

在 1870 年代末期和 1880 年代初期的思想／言論脈絡裡，政體類型知識「概念工程」的成果，大致趨同共向，特別是三大政體類型的

<sup>82</sup> 王韜，《重訂法國志略》，卷 16，頁 6b-7a。

<sup>83</sup> 不過，贊賞「君民共治」的王韜，不曾清楚主張大清帝國是否應當採行在此一體制裡有其重要地位的「議院」，整體言之，他在晚清中國「議院論」的形成過程裡，扮演的是中介者的角色。詳見薛化元、潘光哲，〈晚清的「議院論」——與傳統思惟相關為中心的討論(1861-1900)〉，頁 124-127。

基本辭彙：「君主」、「民主」、「君民共主」，基本已蔚為共識。像是買辦出身的鄭觀應，在 1870 年代末期定稿的著作《易言》(36 篇本)，<sup>84</sup>就論說「泰西有君主之國，有民主之國，有君民共主之國」；<sup>85</sup>有出洋遠游體會異國風土的中國士人，亦可清楚掌握政體類型知識，論說也頗稱完整。如大清帝國駐德使館幕僚錢德培(生卒年不詳)，即稱「德意志為君民共主之國」；<sup>86</sup>又如 1883 年時嘗出洋親睹異國風情的袁祖志(1827-1898)，<sup>87</sup>也清楚知曉法國本為「君主之國，自經德國挫敗之後，改為民主之國」的變化，亦稱德國「為君民共主之國」。<sup>88</sup>再以時代略同的《申報》報導為例，大都可以清楚明確表達政體類型的認知，或說英國與美國「一為君民共主之國，一為民主之國」；<sup>89</sup>或云美國為「民主之國，君稱總統，四年一易」<sup>90</sup>；或報導俄國出現了仿效美國「改為民主之國，如美國總統之由民間推舉」這等主張的訊息；<sup>91</sup>或從「海外各國有君主之國，有民主之國，有君民共主之國」的脈絡裡，歷數法國如何走過「忽而君主，忽而民主，現在則已定為民主」的歷史道路。<sup>92</sup>凡此諸端，正可想見，三大政體類型的知識，已經得到一定程度的迴響。

84 關於《易言》之撰作、版本與研討，參見劉廣京，〈鄭觀應《易言》——光緒初年之變法思想〉，頁 419-521；易惠莉，〈鄭觀應評傳〉，頁 106-119。

85 鄭觀應著，夏東元編，《鄭觀應集》，〈易言·論公法〉，頁 65。

86 錢德培，《歐遊隨筆》，頁 4a，此為 1878 年時的記述。

87 袁祖志於 1883 年隨招商局總辦唐廷樞(1832-1892)，遊歷法、德等西歐各國，凡十個月，歸國後於 1884 年出版《談瀛錄》。參見呂文翠，〈晚清上海的跨文化行旅——談王韜與袁祖志的泰西遊記〉，頁 177、189-194。

88 袁祖志，《談瀛錄》，頁 8a、11a。

89 〈醫國論〉，《申報》，1876 年 6 月 8 日，版 1。

90 〈論歐洲各國人才〉，《申報》，1878 年 2 月 13 日，版 1。

91 〈論俄國大局〉，《申報》，1879 年 6 月 19 日，版 1。

92 〈法界燃燈事考証〉，《申報》，1882 年 7 月 19 日，版 1。

1870年代末期，政體類型知識的「概念工程」固然已呈顯出趨同的樣態，「知識倉庫」裡確實也存在著趨同共奏以外的雜音。問世於1880年代初期，作者不詳的《歐洲總論》，就是一例。<sup>93</sup>這部書將歐洲各國政體分為三種類型：「君主之國」、「民主之國」與「君民參治國」，「議政院」則是三種政體共有的體制。然而，在「民主之國」裡，「頒制定律之權，則全在議政院」，「制治之權」則「操自庶民」。在「君主之國」裡，「議政院」對「國家大事」與「制度律例」可以「各陳己見，暢所欲言」，再由「人君乃審其論理之短長，輿情之拂治，取舍之利害，而定其行止」，實為「一道同風之治，王者之制也」。相形之下，在「君民參治國」裡，「頒定制度之前，必須為上者將一己之旨意，咨達於議政院，使其詳考斟酌」；可是，當「議若不協」之際，「王得專施禁令，罷議寢事」；若仍有異見，「物議沸騰，勢將釀禍，又得散其議院，而另著民間選舉他人以充其職」，故其述評曰：「此其為治若掣肘殊多，恐難為法。」<sup>94</sup>

這樣看來，《歐洲總論》的述說，固然與其他「知識倉庫」的述說不盡符合，<sup>95</sup>惟其不以「君民參治國」為理想形態的述說，認為那是「恐難為法」的體制，則具有提供思考「政體抉擇」的意義，又顯示了和當時的言論／思想潮流頗相一致的趨同樣態。

與《歐洲總論》相類的思考述說，亦可見諸大眾媒體。如《申報》早於1878年即刊出〈論泰西國勢〉一文，<sup>96</sup>綜合論說「泰西之國有所

93 闕名，《歐洲總論》，頁2b云：「前年土俄之役」，按當即1877至1878年間之俄土戰爭；是以本文應視為1880年代前期的作品。

94 闕名，《歐洲總論》，頁4b-5a。

95 如《歐洲總論》以「羅瑪宗國、俄羅斯、普魯士、土耳其」是「君主之國」，並謂這些國家都有「議政院」，即與「知識倉庫」裡其他的述說甚不一致，蓋俄國沒有此一體制，是當時一致的記述。

96 〈論泰西國勢〉，《申報》，1878年1月12日，版3；又，是文末註記

謂君主者，有所謂民主者，更有君民共主者」的內容：「君主者則世及為常，權柄操之自上，如普魯士、土耳其諸國是也」，「民主者，則由眾推舉，任滿而去，與齊民無異，如法蘭西、瑞士等國是也」。至於「君民共主則尤為泰西土風所尚，犬牙相錯，靡國不然」。「議院」體制更為「民主」與「君民共主」的共同特色，而且正因此一體制，遂能產生「君臣同體，上下相聯，初無貴賤之分，情偽可以週知，災患無不共任，有害則去，有利則趨」的現實效果，故對「民主」與「君民共主」政體出以贊語，「泰西之強，職由於此」。

即令如此，面對「政體抉擇」的問題，此文則話鋒一轉，批判「民主」乃是「續亂易滋」的政體，並舉法國總統「麥馬韓」行止為例，<sup>97</sup>謂其總統任期即將屆滿，卻仍「不欲大權旁落，自去其黨，以致勢成孤立」，所以「立意與不直於己者相拒」，由是進而論證「統緒相承，子孫相繼，似屬私於一姓，實為萬世立其大防」的道理。這樣說來，這篇文稿意欲指陳的是，「君民共主」做為「統緒相承」，且復存在「議院」體制的政體，應是比較理想的。面對「政體抉擇」的問題，此文作者的答案，不言可喻。<sup>98</sup>

---

「選錄香港《循環日報》」。眾所周知，《循環日報》是王韜主掌筆政的報紙，惟據「循環日報論說見出し一覽」，未有《循環日報》刊載是文之紀錄，而是文是否為王韜之論著，亦難可確證。參見西里喜行，〈王韜と循環日報について〉，頁96-110。

<sup>97</sup> 即 Marie E. P. de Mac-Mahon(1808-1893)，1873-1879 年任法國總統。

<sup>98</sup> 當然，和《歐洲總論》和《申報》之〈論泰西國勢〉一文一般，未必和政體類型知識「概念工程」言論主流趨同共奏，反而自起音符，別趨異途的其他論說，在1870與1880年代的「知識倉庫」裡，難可盡舉。例如，美國傳教士林樂知(Young John Allen, 1836-1907)主導下的《教會新報》(1868年創刊)及相繼的《萬國公報》，傅蘭雅(John Fryer, 1839-1928)主譯的《佐治窮言》(1885)，都曾引介論議政體類型知識。筆者認為，彼等述說在政體類型知識「概念工程」的地位，自成脈絡，應俟另文處理。



1880年代中期以後，世界上存在著三種主要政體的知識／資訊，在接觸過「西學」的中國士人的知識領域內，已若常識，諸方論者，自可各出機杼。像是大清帝國出使美秘等國欽差大臣張蔭桓(1837-1900)在1889年以英國作為「君民共主」之國的代表，並用以評論時事，如張蔭桓得悉「日本將沿西俗設議院」，即謂此舉為「擬仿英國君民共主之意」；<sup>99</sup>也說美國與法國「同為民主，而制度各殊」。<sup>100</sup>

約略同時，又若康有為(1858-1927)這等思維卓越的士人在構思「烏托邦」的未來遠景時，也出以相同的認知，他的《實理公法全書》以幾何學論式推導人類倫理／群體關係的「應然之道」；<sup>101</sup>關於「君臣門」的部分，即將「民主」、「君民共主」與「君主」列為三種「比例」，批評其各有缺失：「民主」雖是「以平等之意，用人立之法者」，然不如「公法之精」；「君民共主」則是「此失幾何公理之本源者也」；至於「君主」之「威權無限」，「更大背幾何公理」。<sup>102</sup>康有為的《實理公法全書》意義深遠，<sup>103</sup>張蔭桓的一般評述自難堪比擬；惟由他們

<sup>99</sup> 張蔭桓著，任青、馬忠文整理，《張蔭桓日記》，光緒十四年十二月廿二日(1889年1月23日)，頁355；又如，他在述說「英后用款太多，私積巨而公帑絀」，故其「議院」乃「欲與清算」一事的脈絡裡也評論道：「英為君民共主之國，議院故有此權」，均可想見他的認識。參見張蔭桓，《張蔭桓日記》，光緒十五年六月十六日(1889年7月13日)，頁404。

<sup>100</sup> 張蔭桓，《張蔭桓日記》，光緒十五年十月十四日(1889年11月6日)，頁430；不過，他也在「略考秘魯形勝」的脈絡下稱其為「總統四年一易」的「民政之國」：張蔭桓，《張蔭桓日記》，「光緒十四年五月廿一日(1888年6月30日)」，頁299。因是可見，在張蔭桓看來，「民主」、「民政」之意義相等。

<sup>101</sup> 康有為的《實理公法全書》，大致可視為1880年代中期至1890年代初期的作品，參見朱維錚，〈從《實理公法全書》到《大同書》〉，頁235-236、253-254。

<sup>102</sup> 康有為著，姜義華、吳根樑編校，《實理公法全書》，頁288-289。

<sup>103</sup> 黃明同、吳熙釗主編，《康有為早期遺稿述評》，頁43-58；當然，康有

在構思論事之際採取辭彙的一致性來看，可以想見，前此政體類型知識「概念工程」的成果，已然是士人共潤同享的概念語言。

整體觀之，在 1880 年代中期這個時間定點上，政體類型的述說，共呈同現，蓬勃無已，王韜在《弢園文錄外編》的述說，最稱完整，代表政體類型知識「概念工程」在當時「知識倉庫」裡的最高成就。不過，「知識倉庫」裡的述說，雖然已出現趨同一致的景象，在趨同的整體脈絡裡，時有雜音響鳴，彼此之間，也沒有必然的內在理路關係可言。在這個時間定點上，趨同的樣態，更只是表面形式的，各式論說之間，同多於異。各式論說使用的辭彙，仍有不同，區分各種政體的標準，也各有歧異。特別是在以議事機構的存在做為區分「君民共主之國」和「君主之國」的標準之一這一點上，猶未形成共識。如袁祖志知道德國與西班牙、英國都有「上、下議政院」，但他稱前者「為君民共主之國」，後二者「世為君主之國」；<sup>104</sup>《歐洲總論》則記述三種類型的政體都有「議政院」。由此可見，在當時的「知識倉庫」裡，還是有不少記述仍以國家元首的稱謂之不同，做為「君民共主之國」與「君主之國」的分別。然而，面對「政體抉擇」的問題，卻又眾說紛呈，各逞辯鋒，「知識倉庫」裡的政體類型知識「概念工程」的現實意義，普受重視和思考，卻又顯示一定的趨同景象，證明了當年「蔣敦復式」的思考，已然躍登歷史舞台。

政體類型知識「概念工程」從 1840 年代開工，歷經 40 年，至王韜《弢園文錄外編》提出的類型論說與思考，初步集其大成。原先，對於異域制度進行類型概括，還是相當粗略的，迄於《大英國志》的

---

為後來在 1897 年刊行的《孔子改制考》裡，也屢屢引用「民主」之類的辭彙，以證成變法維新的理論根據，更推翻中國傳統的古史論說系統。參見王汎森，《「古史辨」運動的興起》，頁 193-208。

<sup>104</sup> 袁祖志，《談瀛錄》，頁 8a、9b、13b。

述說，以彰顯英國的政體在這個類型架構裡的特出地位，形成政體類型知識「概念工程」的基礎建設之一，也提供了簇新的「思想資源」；到了蔣敦復那裡，政體類型的知識，則被賦予現實意義；1860年代開始，「政體抉擇」的思考，出現在歷史舞台上。王韜更在1870年代初期導入了比較完整的法國例證，各種政體類型的相關論述，亦紛紛出籠。雖然，在分類標準與辭彙的一致性方面，時時傳出不諧之音；但是，「蔣敦復式」的問題，已然形成無可阻遏的潮流。連本來放言「西國政之大謬者」的王韜，到1880年代初期都公開頌揚「君民共治」，做出了「政體抉擇」的表態，宣告政體類型知識「概念工程」的初期完工。

## 五、結論——政體類型知識「概念工程」的意義

西方政體類型知識「概念工程」的創發與建設，在晚清中國的思想界是空前未有的大事業，在「知識倉庫」裡儲備了多采多姿的知識和資訊。以瑪吉士在1845年左右撰成的《新釋地理備考全書》對域外諸國政體提出概括論說做為起點，到1856年首度出版的《大英國志》，做為基礎建設之一，綿延傳衍。耗精費神於斯業者，身分多樣，或如美國傳教士丁韜良等，或如王韜這等思想鉅子，或若張德彝、錢德培和袁祖志等親睹異國風情的人物，乃至《西國近事匯編》、《申報》及《萬國公報》等媒體，各有獻力，而以王韜在1883年提出的論說與思考，初步集其大成。在當時「知識倉庫」裡的主流論說趨向，已經使用「君主」、「民主」、「君民共主」這三組辭彙，「議院」是後二者都有的機構，兩者的差異在於「民主」類型的元首是經由選舉程序產生的，至於「君民共主」類型的國家元首則為世代相襲。然而，政體類型知識「概念工程」的創發與建設，本來就沒有事先擘擬

至精以便按圖施工的總體建設藍圖；「知識倉庫」儲備知識的過程，也無規可循，好似隨意生產堆置儲放。因是，在政體類型知識的主流論說同趨共向之際，異說時現，矛盾歧出，錯亂叢生，理有應然。

不過，早從 1850 年代、1860 年代之交，政體類型知識「概念工程」之開展進行，就已經具有現實意義，如「蔣敦復式」的問題之面世，即促使人們省思「政體抉擇」的問題，實在始終深具「思想資源」的作用；到 1880 年代初期，以王韜的論說和思考為具體徵象，既完整總結過往政體類型知識「概念工程」的成果，他更公開頌揚「君民共治」，做出了「政體抉擇」的表態，影響深遠。<sup>105</sup>

西方政體類型知識的「概念工程」在晚清中國思想界的創發與建設，本是研析探討「民主」思想如何導入中國這一課題不可或缺的內容之一。以本文述說的歷史過程為視角，可以揣想，中國／中國人開始走向「民主之路」，竭力歡迎「德先生」，並不是由於前行者對「民主」思想進行積極「宣傳」或「弘揚」的必然結果。1840 年代徐繼畲等對「無國君」政體(如瑞士、美國等)的讚譽，1860 年代的蔣敦復對「英之議會」可不可以「行於中國」這個問題的思考，1880 年代的王韜對「君民共主」政體的稱賞，都各有其演變的言論脈絡，應該回到它們問世的本來場景進行理解；而不是將這些繁雜的歷史現象／事實簡單概念化，甚至於成為書寫「中國民主思想史」理所當然的組成部分。

就西方政體類型知識自身的脈絡而言，相關辭彙與概念，本在歷史的長河歷經多樣的變化，如「專制」(despotism)這個辭彙在政體類型知識系譜固然向為標準範疇之一，但它在不同時期的具體內容，屢有

---

<sup>105</sup> 當然，1880 年代中期以後，政體類型知識「概念工程」仍復持續進行，後繼者依循著相同的方向，憑藉各種機緣，深描細摹，從而開拓了新的知識／思想空間。相關歷史場景，錯綜複雜，應俟他稿。

變易；<sup>106</sup>以具體個案言之，西方將鄂圖曼土耳其帝國政體的定位，歷經了從「暴政」(tyranny)到「專制」的變化，也反映了「歐洲中心論」(Eurocentrism)的面向；<sup>107</sup>至於在西方政體類型知識創生的過程裡，所謂「東方專制論」(Oriental despotism)甚囂塵上，其實更是在「宗教改革」之後始被歐洲發明建構，做為與西方「共和論」(republicanism)恰成對照項的論述。<sup>108</sup>可以說，西方政體的類型知識如何建構成立為一種「傳統」，絕非不證自明。

再者，西方政體的類型知識也和「政體抉擇」的現實密不可分，既存政體的類型知識，往往會因應現實需要，也面臨被「修正」的命運。如在西方政體類型知識系譜裡始終佔有不可或缺地位的孟德斯鳩(Charles de Secondat, Baron de Montesquieu, 1689-1755)，與前行者一般，強調領土大小規模是共和政體的條件，對所謂「小共和國命題」(the small-republic thesis)的建構，影響深遠。當 1787 年美國召開制憲會議通過新憲法草案後，在等待各州的批准過程裡，孟德斯鳩的理論，正讓反對這部新憲法的「反聯邦派」(the anti-federalists)得以「振振有詞」，以為廣土眾民如美國，是沒有辦法實現共和的。相對的，支持擁護這部新憲法的漢彌爾頓(Alexander Hamilton, 1755[1757]-1804)，邀請了麥迪遜(James Madison, 1751-1836)及傑約翰(John Jay, 1745-1829)，三人聯合以「帕布里亞斯」(Publius)為筆名，發表意見，闡釋新憲草的意義，與「反聯邦派」相論戰。「帕布里亞斯」既批判「反聯邦派」仰仗的孟德斯鳩的「小共和國命題」，卻也依據孟德斯鳩關於「聯邦共和國」(confederate republic)的述說，指陳

<sup>106</sup> 參見 M. Richter, "despotism," pp. 1-18.

<sup>107</sup> Asli Çirakman, "From Tyranny to Despotism: The Enlightenment's Unenlightened Image of the Turks," pp. 49-68.

<sup>108</sup> Patricia Springborg, *Western Republicanism and the Oriental Prince*.

通過這部新憲法對美利堅合眾國前景的重要性。<sup>109</sup>孟德斯鳩創發的政體類型知識，其實可以因應立場不同的論者的現實需要，各取所需，以證己說。這樣說來，政體類型知識的創造生產與消費流通，其實不能外乎具體的歷史場景。

因是，本文採「脈絡化」的取徑，以蔣敦復與王韜為中心，述說他們對於政體類型知識「概念工程」與導入西方「民主」相關思想之「貢獻」，應可展現，前行者的思想努力及其軌跡，率皆自成理路，各有獨特的「思想資源」的價值和意義，更是在具體的歷史情境裡出現的，難以一言概括。所以，進行「民主」思想在中國的知識生產事業，必須將錯綜複雜的歷史場景，盡可能詳縝細密地還諸其本來的歷史時空。如果採取這等「脈絡化」的研究取徑，持續考察相關的課題，或可拓寬我們對晚清以降中國思想史的認識空間。本文「野人獻曝」，希望略具這樣的提醒作用。

## 附錄——蔣敦復〈海外兩異人傳·華盛頓〉撰述時間考

蔣敦復撰述〈海外兩異人傳〉，分別述說「該撒」（即 J. Caesar）與華盛頓的生平，並有評語，類似史論之作。確切撰述時間不詳，述說「該撒」者，刊於 1857 年出版的《六合叢談》；<sup>110</sup>述說華盛頓者，可能也是同一時期的作品。這篇〈海外兩異人傳·華盛頓〉說，美國

---

<sup>109</sup> 研究批准美國新憲草的論辯歷程及其理論依據之述說，不可勝數；本文簡述，基本依據 Terence Ball, "A Republic- If You Can Keep It," pp. 137-164; Levy Tomlinson, "Beyond Publius: Montesquieu, Liberal Republicanism, and the Small-Republic Thesis," pp. 50-90.

<sup>110</sup> 上海圖書館編，《中國近代期刊篇目彙錄》，頁 1。

建國後：

其罷帝號，勿傳世，勿終身執國柄，分建列邦，邦之百姓推擇一人統其眾，為伯勒格斯(君民共政之稱)，眾伯勒格斯中推擇一人為大伯勒格斯，軍國大事咸取決焉。

以蔣敦復個人使用「伯勒格斯」一辭的前後脈絡來看，1860年，蔣敦復撰〈英志自序〉，曰：

地球九萬餘里，邦土交錯，立國之道，大要有三：……一、民為政，西語曰伯勒格斯，今之美利堅(俗名花旗，在亞墨利加州〔洲〕)及耶馬尼、瑞士等國是也。<sup>111</sup>

1866至1867年間，撰〈擬與英國使臣威妥瑪書〉，則曰：

泰西各國，政有三等：一、民為主，西語曰伯勒格斯，今南、北美利加等國是也。<sup>112</sup>

兩文都明確說明，在「民為政」或「民為主」的政體裡，其國主之稱謂曰「伯勒格斯」。可以想見，在1860年後，他已固定使用「伯勒格斯」一辭來稱調美國體制下的「總統」一職。因此，他在這篇〈海外兩異人傳·華盛頓〉裡說：「伯勒格斯」為「君民共政之稱」，應當是在此之前的觀念。所以，這篇〈海外兩異人傳·華盛頓〉，可能也是1857年左右的作品；或保守估計，是1860年以前的作品。

(本文於2011年7月14日收稿；2011年8月27日通過刊登)

\* 本文為行政院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美國憲政與近代中國政治文化》(計畫編號：NSC-97-2410-H-001-097-MY2)之部分成果，謹致謝忱。

<sup>111</sup> 蔣敦復，《嘯古堂文集》，卷7，〈英志自序〉，頁2b-6a；寫作時間繫年為「咸豐十年(1860)」。

<sup>112</sup> 蔣敦復，《嘯古堂文集》，卷3，〈擬與英國使臣威妥瑪書〉，頁15a-22b。

## 參考書目

### 一、傳統文獻

《申報》(上海)。

《西國近事匯編》，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癸酉同治十二(1873)年本。

丁韞良譯，《萬國公法》，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同治三年(1864)京都崇實館存板本。

文慶等纂輯，《籌辦夷務始末》，北京：故宮博物院，1930，景印道光清內府抄本。

王韜著，方行、湯志鈞整理，《王韜日記》，北京：中華書局，1987。

王韜著，朱維錚、李天綱編校，《弢園文新編》，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

王韜，《弢園文錄外編》，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光緒廿三年(1897)弢園老民刊於滬上本。

王韜，《重訂法國志略》，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光緒十六年(1882)淞隱廬刊本。

王韜，《淞濱瑣話》，濟南：齊魯書社，1986。

王韜，《普法戰紀》，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韜園王氏刊、遯叟手校本。

加藤弘之，《明治文化全集》，卷3，東京：日本評論社，1952。

田濤主編，《清朝條約全集》，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9。

朱一新，《無邪堂答問》，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



圖書館藏光緒廿一年(1895)廣雅書局刊本。

朱克敬著，楊堅點校，《瞑庵雜識·瞑庵二識》，長沙：岳麓書社，1983。

朱克敬，《通商諸國記》，收入王錫祺輯，《小方壺齋輿地叢鈔》，  
帙 11，臺北：廣文書局，1962，景印本。

岡本監輔編纂，《萬國史記》，日本吹田：關西大學「增田涉文庫」  
藏明治十一年(1879)岡本氏藏版本。

徐繼畲，《瀛寰志略》，收入白清才、劉貫文主編，《徐繼畲集》，  
第 1 冊，太原：山西高校聯合出版社，1995。

袁祖志，《談瀛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郭廷以圖書館  
藏光緒十年(1884)上海同文書局石印本。

康有為著，姜義華、吳根樑編校，《康有為全集》，第 1 集，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張德彝，《航海述奇》，收入王錫祺輯，《小方壺齋輿地叢鈔》，帙  
11，臺北：廣文書局，1962，景印本。

張德彝，《稿本航海述奇匯編》，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

張蔭桓著，任青、馬忠文整理，《張蔭桓日記》，上海：上海書店出  
版社，2004。

梁廷枏著，駱驛、劉驍校點，《海國四說》，北京：中華書局，1993。

郭嵩燾，《郭嵩燾日記》，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瑪吉士，《新釋地理備考全書》，收入《海山仙館叢書》，臺北：中  
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道光廿七年(1847)番  
禹潘氏刊本。

裴孝賢編輯，《美國歷史文獻選集》，香港：今日世界社，1987。

慕維廉，《大英國志》，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  
書館藏上海墨海書院刊本(1856)。

蔣敦復，《嘯古堂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

圖書館藏同治七年(1868)上海道署刊本。

蔣敦復，《嘯古堂文集》，收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近代中國對西方及列強認識資料彙編》，第1輯，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2。

鄭觀應著，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錢德培，《歐遊隨筆》，收入王錫祺輯，《小方壺齋輿地叢鈔》，帙11，臺北：廣文書局，1962，景印本。

闕名，《歐洲總論》，收入王錫祺輯，《小方壺齋輿地叢鈔》，帙11，臺北：廣文書局，1962，景印本。

魏源，《海國圖志》，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743-744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光緒二年平慶涇固道署重刊100卷本。

魏源，《海國圖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67，道光廿七年古微堂鐫板60卷本。

## 二、近人論著

上海圖書館編，《中國近代期刊篇目彙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于醒民，〈蔣劍人——介紹西方資產階級民主制度的先行者〉，《北方論叢》，3(哈爾濱，1985)，頁89-93。

方維規，〈「議會」、「民主」與「共和」概念在西方與中國的嬗變〉，《二十一世紀》，58(香港，2000)，頁49-61。

王汎森，〈戊戌前後思想資源的變化——以日本因素為例〉，《二十一世紀》，45(香港，1998)，頁47-54。

王汎森，《「古史辨」運動的興起》，臺北：允晨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7。

- 王家儉，《魏源年譜》，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7。
- 王爾敏，《晚清政治思想史論》，臺北：華世出版社，1980。
- 朱維錚，《求索真文明——晚清學術史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 西里喜行，〈王韜と循環日報について〉，《東洋史研究》，43：3(京都，1984)，頁 96-110。
- 吳以義，〈王韜研究所提示的中國近代史的複雜性——評忻平《王韜評傳》和柯文《在傳統和現代性之間》〉，《新史學》，11：2(臺北，2000)，頁 145-165。
- 呂文翠，《海上傾城——上海文學與文化的轉異，1849-1908》，臺北：麥田出版，2009。
- 呂實強，〈甲午戰前西方民主政制的傳入與國人的反應〉，收入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委員會主編，《中國近代現代史論集》，第 18 編，《近代思潮》，臺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頁 277-316。
- 忻平，〈王韜與近代中國的法國史研究〉，《上海社會科學院學術季刊》，1(上海，1994)，頁 166-174。
- 忻平，《王韜評傳》，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0。
- 汪曉勤，〈偉烈亞力的學術生涯〉，《中國科技史料》，20：1(北京，1999)，頁 17-34。
- 松岡八郎，《加藤弘之の前期政治思想》，東京：駿河台出版社，1983。
- 林啟彥、黃文江主編，《王韜與近代世界》，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2000。
- 易惠莉，《鄭觀應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
- 林學忠，《從萬國公法到公法外交——晚清國際法的傳入、詮釋與應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 金觀濤、劉青峰，《觀念史研究——中國現代重要政治術語的形成》，

- 香港：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2008。
- 胡維革、于秀芹主編，《共和道路在近代中國》，長春：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1。
- 原付川、姚遠、衛玲，〈《西國近事匯編》的期刊本質及其出版要素再探〉，《今傳媒》，5(西安，2010)，頁 104-106。
- 徐興慶，〈王韜と近代日本——研究史の考察から〉，收入陶德民、藤田高夫編，《近代日中關係人物史研究の新しい地平》，東京：雄松堂，2008，頁 87-115。
- 馬西尼(F. Masini)著，黃河清譯，《現代漢語詞匯的形成——十九世紀漢語外來詞研究》，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7。
- 張志春，《王韜年譜》，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
- 梁台根，〈近代西方知識在東亞的傳播及其共同文之探索——以《佐治芻言》為例〉，《漢學研究》，24：2(臺北，2006)，頁 323-351。
- 陳志奇，《中國近代外交史》，臺北：南天書局，1993。
- 陳雪嬌，〈王韜思想研究綜述〉，《魯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5(煙臺，2008)，頁 30-33。
- 鳥海靖，《日本近代史講義——明治立憲制の形成とその理念》，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88。
- 奧田晴樹，《立憲政体成立史の研究》，東京：岩田書院，2004。
- 黃明同、吳熙釗主編，《康有為早期遺稿述評》，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88。
- 鄒振環，《西方傳教士與晚清西史東漸——以 1815 至 1900 年西方歷史譯著的傳播與影響為中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 熊月之，〈晚清中國對美國總統制的解讀〉，《史林》，1(上海，2007)，頁 1-11。
- 熊月之，《中國近代民主思想史(修訂本)》，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

出版社，2002[1986]。

劉泱泱等編，《魏源與近代中國改革開放》，長沙：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5。

劉廣京，《經世思想與新興企業》，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0。

潘光哲，〈追索晚清閱讀史的一些想法——「知識倉庫」、「思想資源」與「概念變遷」〉，《新史學》，16：3(臺北，2005.9)，頁 137-170。

潘光哲，〈晚清士人對英國政治制度的認識(1830-1856)〉，《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17(臺北，2000)，頁 147-196。

滕固，《蔣劍人先生年譜》，臺北：廣文書局，出版年缺。

閻小波，《近代中國民主觀念之生成與流變——一項觀念史的考察》，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1。

薛化元、潘光哲，〈晚清的「議院論」——與傳統思惟相關為中心的討論(1861-1900)〉，《中國史學》，7(東京，1997)，頁 117-149。

鍾叔河，《走向世界——近代中國知識分子考察西方的歷史》，北京：中華書局，1985。

齋藤毅，《明治のことば——文明開化と日本語》，東京：講談社，2005。

魏外揚，《中國教會的使徒行傳——來華宣教士列傳》，臺北：宇宙光全人關懷機構，2006。

蘇精，《清季同文館及其師生》，臺北：作者自印本，1985。

Ball, Terence. "A Republic- If You Can Keep It," in Terence Ball and J. G. A. Pocock eds., *Conceptual Change and Constitution*. Lawrence, KS: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1988, pp. 137-164.

Chang, Hao. *Liang Ch'i- ch'ao and the Intellectual Transition in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 Çirakman, Asli. "From Tyranny to Despotism: The Enlightenment's Unenlightened Image of the Turk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33(February 2001), pp. 49-68.
- Gasiorowski, Mark J. "The Political Regimes Project,"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25:1(Spring 1990), pp. 109-125.
- Liu, Lydia H. *Translingual Practice: Literature, National Culture, and Translated Modernity—China, 1900- 1937*.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 Richter, M. "despotism," in D. Wiener ed., *Dictionary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73), Vol. II, pp. 1-18.
- Springborg, Patricia. *Western Republicanism and the Oriental Princ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2.
- Tomlinson, Levy. "Beyond Publius: Montesquieu, Liberal Republicanism, and the Small-Republic Thesis,"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27: 1 (Spring, 2006), pp. 50-90.

## **Knowledge of the Different Types of Western Political Regimes in Late Qing China: Jiang Dunfu and Wang Tao**

Kuang-che Pan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The introduction of knowledge of the different types of Western political regimes was the driving force for conceptual change in late Qing China. This essay focuses on the ideas of Jiang Dunfu and Wang Tao, analyzing the sources of their knowledge, their contribution to the introduction and growth of this knowledge in China, and how they used this knowledge to discuss the future of the monarchical regime of the Qing Empire.

**Keywords:** different types of political regimes, Jiang Dunfu, Wang Tao, “stock of knowledge,” “intellectual resources,” late Qing China